

西泠印社第一代中兴功臣

□陈振濂

西泠印社第三任社长张宗祥先生,在诸社长中以学术著称,因不以艺术名世,故尔与吴昌硕、沙孟海等相比,似乎声望有所未及。且其一生专攻图书古籍、目录版本的书案枯寂之学,于书画篆刻是别一路径,又加之处于新中国成立之初文艺相对不受重视的特殊时期,故而即使是研究史学的学者专家,凡谈起张宗祥先生也大都只言片语,语焉不详,缺少艺术大师风云际会、一呼百应的气势。

其实张宗祥先生在青年时代即以艺术自期,适足以成为证明的,是他的《论书绝句》为民国初年书学史上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至于他的一手书卷气极浓的行楷,虽出自实用的抄录古籍,却无一丝尘俗习气;有焚膏继晷、日积月累之功夫,却能在儒雅与清新中成就一家面貌。称其为“学者气充沛”的文人书法之专业名家,以与一般仅凭兴趣和童塾那些点划功夫应世的名人字拉开距离,从而成就一世书名,亦恐绝非过言。此外,他与鲁迅、胡适、蔡元培等名人的诗文往还与同事共职,又在民国初年即任浙江省教育司长(即教育厅长),更在书法艺术与目录版本学问之间左右逢源、相得益彰,这样的资历与资格,是许多名家大师也未必具备的。正是这些因素,使得张宗祥先生有机缘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为百年西泠印社存亡继绝的第一代中兴功臣,从而使西泠印社的历史得以赓续,文脉得以延伸。没有他,今天早就没有西泠印社了。

校淳化阁帖记

□张宗祥

予向有肃府明拓本《淳化阁帖》十卷,弱冠时,以书籍数种从单不厂兄处易来,相随之五十余岁,均在左右。抗战时,留硃石故居,为人窃限,仅存零篇数十页,遂并藏书皆赠浙馆。在杭,见贾师宪刻阁帖一百二十七页,中有二十余页,墨色较淡,当是后配之物,余皆墨如点漆,精彩奕奕,真初拓也。索价昂,力不能得。贾氏当时有廖莹中为之鉴别钩摹,王用和为之镌刻,所据之本,又为银锭初本,宜其独擅牲场。壬寅夏,谢政府招待莫干山避暑之举,解衣盘礴榆园园底小屋中,对盆兰,摩挲古玉旧磁,颇自得也。坊贾适送日本珂罗板印贾刻阁帖至,因购之,同时又购得商务印书馆石印游相本阁帖一种,因借为消暑之物。尽数日之力,一一对比,得小异同,辄书注其旁,又复录为此篇。埋头故纸堆中,门外炎威,已尽忘矣。

《淳化阁帖》始刻于宋太宗淳化三年。当时收集古代名人墨迹,藏淳化阁中,命翰林院侍书王著鉴别,选为十卷付刻,即今每卷末所标“淳化三年壬辰岁十一月六日,奉圣旨模勒上石”云云者是也。其中伪笔杂收,或真笔而张冠李戴,或文字割裂,东拼西凑,甚或一字分为二字,昔人已屡斥其鲁莽灭裂;然汉晋真迹,得能一线不绝,绵延至今,略存规范者,端惟此帖是赖,书法中实有大功,不可没也。帖后所云上石,实则非石为为枣木。雕版既成,藏在中禁,偶拓以赐勋戚,流传不多。元祐中,板裂,乃以银锭镶联裂处。贾氏所刻,即据此初裂之本。后为明顾从义茂藏,世称顾本。今第一卷唐太宗《两度帖》六七两行之间,第二卷《象象书顾恺帖》六七两行之间,皆有锭痕,此其证。此后随裂随镶,银锭痕多少各有不同,世遂又有大小银锭本之说。自淳化之后,大观之间,丛帖刻石公私不少,要与淳化略有异同。淳化自绍兴十一年始摹勒上石,石置国子监。淳熙十二年,又刻于修内司,后乃有《潭帖》《绛帖》。宋末贾氏又刻于半闲堂,同时廖莹中又刻于世彩堂,此为宋代淳化传刻之大略。绍兴、淳熙二帖绝少见,是否根据银锭,已无可考,贾廖二刻,则皆银锭本也。日本影印贾帖,照原帖缩小,此其短处。原帖明为陈继儒所藏,清为张廷济所藏,各有题记。至商务馆影印之游相本,原为淳祐五年己巳十二月任右丞相游侣所藏之物,元为康里巎巎所藏,明为杨溥、项元汴所藏,清为李光地、蒋廷锡等所藏,各有题记,翁方纲四跋,何绍基一诗,所归梁启超。此帖观其题记,似属传统分明,然元明数跋,未必可恃。在任公京寓中,予亦曾见原本,墨色万不及予所见贾帖之佳,黑而不亮,浓而不厚,评为明拓,较为合宜。若云游相所藏,则当推在银锭以前印本,因帖中无一锭痕故也。以此帖置在银锭本前,决不可能。予认为此不过肃府初拓之物耳,以唐太宗书《八柱承天帖》中巎字中无石花一横可证也。校中姑仍袭《田游帖》之名。

（摘自西泠印社出版《铁如意馆碎录》）

张宗祥：西泠印社的中兴功臣

张宗祥先生为著名书家，且已久誉近代书法界，系日积月累之功，才名至实归。据张老《自编年谱》记载，其幼岁即随外祖父沈韵楼写字，10岁临《多宝塔》，15岁临《颜氏家庙碑》，17岁参临《麻姑仙坛记》。22岁得旧拓《淳化阁帖》，开始习写行草，临《争座三谢大麻姑仙坛记》，32岁倾力临李北海，得明拓《思训碑》，司唐人笔法。24岁得《麓山》《法华》各碑临写，又先后临《龙门造像》《张猛龙碑》，兼习汉隶《史晨》《西岳华山》等，从以上初学之临写，到中途由真至行，又深悟自己书之力薄之弱，后来参临北碑学峻利高古，学汉隶之清丽刚健与豪放野逸等，可见证一个书家成长的历程和其中孕育一个书法大家所奠基的功底。赵诚先生在《学者，俊彦，书家》一文中曾说，“自古以来，书法技艺超轶者，或为一时俊彦，或为一代学者。所谓一时俊彦，多为长于诗文雅士文人，虽不专攻书写艺术，却颇得书法之妙，甚或有绝妙超尘之作。这一类书家，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流派的艺术风格，为书艺作出重大贡献，如欧体、颜体。所谓一代学者，多为研究汉字的某一方面专家，虽不以书写艺术为专业，却对汉字结构流变、书写之笔势笔法颇有研究，甚或有华绝逸越之作。这一类书家，有可能研究出一些与汉字结构、书写方法有关的理论，为书学作出过重大贡献，如许慎的《说文解字》，蔡邕的《笔论》《九势》。”赵诚先生此文虽是论述启功先生的，但于张宗祥先生，也甚为切合。张宗祥学者与书家兼合，其文史校勘卓成大家，书艺一事，博采之中渐成一体，于今书坛，无人不识，其《书学源流论》《校淳化阁帖记》《与吴敬生兄论书》《论书绝句》等，堪为中国书学之遗珍，于此，其日升为书坛重镇是顺理顺势之趋。事实也确如此，一些已被炒成书坛大师级的人物，其作品与张宗祥并置，莫不逊色而自显其弱。其情形恰似殷墟甲骨文之弘字，系弓背隆起以示威力，为高为大。张宗祥之弓，平日不被或少被人引拉，故其由强力而示高大事，鲜见书坛。而另有满口飘飞之大师者，则多为门生后人不时拉弓不歇而作成。历史虽时被开玩笑，然历史之订正却会澄清浮泛浅见之论。故张宗祥于书坛大家之名重，日显其端，则系历史之使然，书艺之品质所成也。

作为学者与俊彦，张宗祥于《论书绝句》中更可见出其个性：

一、对徐文长书法，张宗祥评价为“俊逸有余，沉着不足”；面对徐的学生郑板桥之书法，更认为“书法尽中锋”，“有乱石铺阶之喻”，应逊于其师。

二、对赵子昂之书法，张宗祥亦毫不留情予以批判：“独酣过过多，时有烂漫之笔。”

三、对大师级人物董其昌之书法，张宗祥也毫不避讳地指出其缺陷：“然香光胸襟难清旷，仅至唐人，故凋疏之弊，在所难免。”

四、对赵之谦书法，张宗祥明确指谬：“转折起讫之处，因毫柔难尽其力，未能十分斩绝。”

五、作为西泠印社的社长，他于读碑刻之心得警示后辈学人：“南北读碑混刀笔，可怜误后来人”。于吴昌硕门徒只求与老师形似，不求神似的行果，张宗祥更是严厉批评“印则乱凿、画则乱涂、书则乱写”。

六、更为惊人的是，张宗祥对严嵩的书法以“厚重恣肆”予以较高评价，而于市场甚为看重之曾国藩书法，张宗祥认为“它非精品，大字尤拙”；对蜚声海内外的康有为书法指斥为“一法不精”（康喜综合）。好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其学术个性在大学养基础下十分突出。

如此犀利的批判个性，于历史上有个性的名家之批评，实乃不谋而合。如马一浮先生与熊十力先生原是好友挚交，1939年马一浮先生乐山乌尤寺创办复性书

张宗祥的学术个性

□王学海

院，特邀熊十力去讲学，一次熊十力讲儒学义理兼谈治学方法，熊十力所讲对儒学的分析与提倡治学方法为“泛览”一说，与马一浮相左（马提倡精读），熊十力讲完后，马一浮即上台说，“熊子真讲的话完全错误，一句也不能听（熊当即拂袖而去）。”同样，在对待书家的作品作评判时，马一浮与张宗祥亦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马一浮先生对吴昌硕之评语：“晚近海派如吴昌硕辈，气味恶劣，不可向迹矣！”对其学生丰子恺之漫画，指出其“笔墨痕迹太重，亦是未臻超脱”。又如对书法名家之评价，说“刘石菴结体自住，而伤于痴肥”，批评郑孝胥“结体未善”等，马、张之批判口吻，何其相似！

张宗祥学术个性的第二个显例，是他既懂医又业余行医，然对中医“五行”加之质疑。我们知道，张宗祥一生自学中医并入列正宗医门，1954年12月被浙江医学院聘请为该院科学研究委员会中医中药组委员，《浙江中医杂志》同时聘请他为编审顾问。张宗祥生平也著有《本草简要方》《医药浅说》《本草经新疏》等。张宗祥同意辩论施治，却反对“五行”一说。他认为五行相生相克之说，多有牵强附合，究其原因，张宗祥认为：“自古至今，自今以至无穷，人类新病，愈研究而愈多，当一病新起，或数年而尽其因，或数十年而未明其理，必欲强不知以为知，由为解说，于是六经传合五行生克之说起矣。”因此，张宗祥告诫世人，“独不可牵率于太阳、太阴之名，且执著于传经合病之说，一牵率执著，使人如坠五里雾中，迷失方向矣”。郑绍昌、徐洁先生在其《国学巨匠——张宗祥传》中也指出：“在破除迷信、崇实创新的理念下，张宗祥对中医药和中国戏曲，进行了开创性的理论和实践工作。”“中医药理论向以五行生克为说，宋人沈括对此已表示怀疑。张宗祥结合五行古论和临床实践，指出五行生克这种原始理论，不能真正说明中医病的病理和药理。其中牵强附会、荒诞无稽之处，比比皆是。中医药的可贵在于药效和用药的准确。剔除五行生克之说，集中精力研究中药的药理和辩证施治——治病同时兼及全身的医理，则将有力地推动中医药的发展。”张宗祥对五行之积弊，还有一针见血的批判，“中医喜以五行生克之说谈病记，实为不妥。且说药亦拘泥于寒温润燥之言，不究真正治病之效。李时珍所编《本草纲目》虽为本草最博识，但药方收得少，无用之物收得多，徒费纸墨。且为时已三百年，药之产地、药之功用，均已不同……求中国医理，食药物之功用及用药之经验不谈，而徒泛论五行生克虚无浮泛之理，宜乎中医之日以不振乎”此外为“五行”一说，张宗祥又问于《尚书·洪范》（五行一说最早见于《尚书》），并借鉴于古代名医扁鹊等，其做学问之慎密，见解之不囿于陈规，学术个性之根基也更扎实。

张宗祥在校注古籍中，其学术个性也相当突出。此一为其力作《论衡校注》（2010年重版）之《校注论衡序言》中所力排众人对《论衡》作者王充的多方攻讦。张宗祥首先对攻击者之“孔子不宜问，孟子不宜刺”一说予以质疑，后说善恶“古无定证，更无定论。性善之说，一隅而已”。又说，“圣贤，人也。人，物也。”此于客观、高远之探究事物、察圣贤、达义理，实为文中侠士之勇也。而对其针对王充“诘难仲任者，必欲仲任叙其祖、父为不任气，不遭豪家之怨，方合于孝”之“曲仲任之笔”，先生更于“陋儒世俗之言，未可准也”地给予严厉批判。并即以褒颂“《论衡》一书，九虚、三增以癖虚妄，明死无鬼，明死无知，葬当从薄，灾不自灭。当藏纬盛行于世，五行说胜之时，独能标真义、疾虚妄，无援无助，奋孤笔以战古今，此真特立卓见之士”，勇对定论与众说，大胆挑明自己观点，为王充与《论衡》作辩，张宗祥是历史上

第一人，亦为正义之笔仗义执信之典范。

此二为张宗祥编撰《礼记》的工程。《大小戴礼记合纂》一书，系戴德八十五篇之《大戴礼记》与戴圣删《大礼》至四十六篇之《小戴礼记》，后又有马融又以《月令》《明堂位》《乐记》合入《小戴礼记》成今日通行本《礼记》。（此说亦在学界有争议，此处不论）而张宗祥先生则以李清《南北史合注》《南唐书合订》，赵绍祖《新旧唐书互证》之例，合纂成《大小戴礼记合纂》。所以在《国学巨匠张宗祥传》中，作者将此举称张宗祥为“中国经学的改革家”，是突围了乾嘉学派墨守陈规者，首创了中国经学的合纂。可见勇于创新，敢于走险，亦为张宗祥之学术个性。

此外，张宗祥又与国学大师章太炎一样喜收藏古玩字画，但又都从不是吝啬鬼、守宝奴。并由此自其培养处世审美境界。章太炎先生在其《遗囑》里，清楚写明“余于器玩素不属意”。张宗祥曾在家信手札（《张宗祥家信手札》，王学海主编，中国戏剧出版社2013年1月版）中提及“有钱买点古董、书画玩玩……玉器可以说杭州好一点玉器皆聚在我寓中了”。然张宗祥亦立下遗嘱，嘱家人将自己所藏古玩玉器字画悉数捐赠给了国家（见“铁如意馆张宗祥生平事迹介绍”）。也曾听说抗战期间，蒋百里一日去张宗祥寓所，先生不在，蒋百里见其书桌上有一玉，甚喜爱，便随手取走。后张宗祥先生返家，查玉如何不见，知密友蒋百里来过，便说此玉尚一般，百里既喜玉，当予好的相赠，即从抽屉里取出一块上好好玉，亲自去蒋宅给百里送去。爱玉而不沦为玉奴之豪爽性格可窥一斑。也由此，章太炎夫人汤国梨在章太炎去世后选择墓地和规格征求张宗祥意见时，张宗祥即对其言：太炎先生名之流芳在学术不在墓地大小，于是章夫人便采纳张宗祥意见，墓地墓碑等均从简办之。

张宗祥其中著名的一本校勘校注的书叫《越绝书校注》，在学术界，这本由张宗祥校注的书，被称为是“有史以来对《越绝书》的第一个校注本，也是惟的一个校注本”（李步嘉《越绝书研究》），是“在《越绝书》注释方面开了先河”。“惟一”、“开了先河”，如此高的学界评价，来源于张宗祥在校注《越绝书》时的两个特点：一是以明正德己巳翻刻宋本、双柏堂本、张佳胤本、明万历年间翻刻元本、嘉靖二十四年孔文谷刊本、嘉靖丁未陈垣刻本、吴馆古今逸史本、程荣与河锺汉魏丛书二种等八个版本进行多元广览地校注；二是用对校与本校互证（即上下文对校，再予本文本文互证）——“多元广览校注”及“对校与本校互证”，其学术个性不能不谓之鲜明与独特。

在敦煌经卷的研究考证中，见有当代专家黄征之博士生赵红著《敦煌写本汉字论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4月版），其在《敦煌写本书写形式》一章中，又专门详细介绍了敦煌经卷书写的纸张和形制，特别对“硬黄”纸的形成（打纸）及今日研究成果作了阐述，然却忽略了古人为何要这么考究之因。而张宗祥在任京师图书馆主人时，“穷两年之力，成目四卷”，即编成善本书目四卷。在此期间，张宗祥更对敦煌经卷作了研究：“而敦煌写经七千余卷字，传者尽属硬黄，又足证古人喜书素绢，实为爱用光纸之故。”张宗祥在这里不仅为我们研究出了为何古人造纸要这么煞费苦心，花工夫下成本去让纸在热熨斗上匀涂黄蜡，轻轻捶打成高级光滑的硬黄纸，实是因古人喜用光纸书写之故。并又能从中进一步推导出古人喜用素绢书写，也是由此而来的道理。这种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研究中，能以犀利之眼光、深厚的学养，一眼洞穿其奥秘，又在释奥之时散发学科交叉研究的多元思路，诚执逻辑推导来引出人们对历史事物的新认识，张宗祥此学术个性当应更为后人所重视。

张宗祥著作目录

《手抄六千卷楼读书随笔》四卷，1945年撰，手写定本，家藏本。
《还都草》（诗集），1949年成集，手稿存浙江图书馆。
《铁如意馆手抄书目》，1950年撰，手写定本，存浙江图书馆。
《张宗祥题画诗墨迹》，1953年手书，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
《中国戏曲锁谈》，1954年撰，手稿存浙江图书馆。
《平庵母》（昆曲剧本一种），撰于20世纪50年代，手稿存浙江图书馆。
《马二先生》（京剧剧本一种），撰于20世纪50年代，手稿存浙江图书馆。
《卓文君》（京剧剧本一种），撰于20世纪50年代，手稿存浙江图书馆。
《浣纱记》（昆曲剧本一种），1957年改编，手写定本，存浙江图书馆。
《荆州记》（昆曲剧本一种），1958年撰，手写定本，存浙江图书馆。
《全宋诗话》100卷，1958年校辑本，手写定本，存浙江图书馆。
《山海经图赞》，1958年校正元人抄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印行。
《三辅黄图》，1958年校订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印行。
《吹剑录全集》，1958年校辑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印行。
《云谷杂记》，1958年校辑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印行。
《国榷》108卷，420万字，1955年校辑成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本草经新疏》12卷，60万字，1959年撰，手写定本，存浙江图书馆。
《论衡校注》30卷，1959年校辑本，手写定本，存浙江图书馆。
《归杭草》（诗集），1959年成集，手稿存浙江图书馆。

《铁如意馆碎录》五卷，1960年撰，手稿存浙江图书馆，西泠印社出版社2000年版。

《吕氏春秋高诱订正》十卷，附录一卷，1960年撰，稿存何处不详。
《校点淳化阁帖》，1962年校点，家藏本。
《大小戴礼记合纂》，1963年校注辑定本，稿存何处不详。
《晏子春秋》，1962年校辑本，手写定本，存浙江图书馆。
《冷僧自撰年谱简编》（张钹节写本），家藏。
《归杭续草》（诗集），1965年成集，手稿存浙江图书馆。
《记一幕猴戏》，撰写时间不详，手稿存浙江图书馆。
《疑是录·文章纵论》，撰写时间不详，手稿存浙江图书馆。
《临池一得》，撰写时间不详，手稿存浙江图书馆。
《苦笑集》，撰写时间不详，手稿存浙江图书馆。
《芥子录》，撰写时间不详，手稿存浙江图书馆。
《小百家一厘书叶一百十三页》，存浙江图书馆。
《复庄今乐府选目》一卷（110册，401卷），稿本存浙江图书馆。
《不满观斋诗稿》，20世纪20年代撰，手写本存浙江图书馆。
《集字对联选》，何时辑录不详，手稿存浙江图书馆。
《张宗祥书学论丛》，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张宗祥书信墨迹》，2005年海口市政协文史文史委员会编印。
《张宗祥墨迹》（书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

〔注〕

本目录中之“手稿”，系手写草稿；“手写定本”系指可直接影印之标准写本；“手书本”系标准的行楷书法，可直接影印。

《二十四史目正·附清史目拟》，1915年著，稿存否不详。
《灵魂学》一卷，1917年撰，手稿存浙江图书馆。
《书法源流论》一卷，1918年撰，手稿存浙江图书馆。
《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1919年编撰，手写定本二，一存国家图书馆，一存浙江图书馆。
《说郛》（40册，100卷），1926年校辑本，商务印书馆出版。
《洛阳伽蓝记》，1926年校辑本，商务印书馆出版；1955年再版。
《嵇康集》，1926年校辑本，稿存浙江图书馆。
《高注三书异同订》，1927年撰，手写定本。其中“订同”一册存，家藏；“定异”存否不详。
《清代文学概论》，1929年撰，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手写定本，存浙江图书馆。
《皇清续文献通考·地理志》，1929年撰，存否不详。
《铸鼎录》，1934年撰，稿毁于日机轰炸。回忆重写稿收入1995年8月之《古今谈集萃》，浙江省文史馆编。
《铁如意馆随笔》，1937年撰，1984年载《中华文史论丛》。
《游桂草》（诗集），1938年成集，手稿存浙江图书馆。
《王安石字说解》，1943年辑录，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医药浅说》，1943年撰，上海书店1984年印行。
《本草简要方》八卷，1943年撰，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出版。
《铁如意馆读书札记》四卷，1943年撰，稿存浙江图书馆。
《张宗祥论书诗墨迹》，1943年手书，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
《入川草》（诗集），1945年成集，手稿存浙江图书馆。
《巴山夜雨录》，1945年撰，手稿存浙江图书馆。